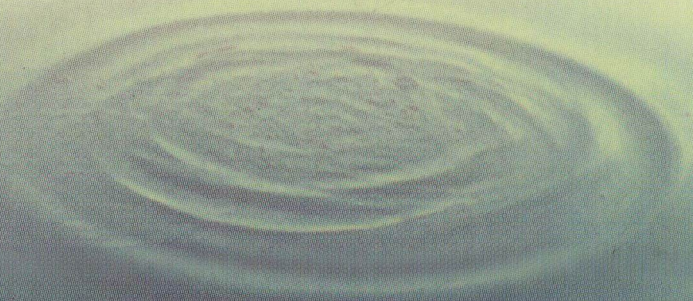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
封面题字

丁芳芳
严烈



吴文化知识丛书

吴地歌谣

蔡丰明
编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吴文化知识丛书》编委会

顾 问 李学勤 吴 泽 陈伯海
王国平 陈璧显 王竹平
何正明 毛海圻 黄士良

主 编 高燮初

副主编 程德祺 袁家麟 熊大桐
周传铭 张金海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列)

许海泉 沈道初 周传铭
张金海 袁家麟 唐茂松
高燮初 程德祺 程述先
熊大桐

序

区域文化研讨热潮的涌动，是近年来中国学界一个引人注目的趋向，它跟当前改革、开放的大形势密切相关。市场经济的取向，冲破了大一统计划经济的体制，为地区经济的自立发展打开了广阔的空间，而调动、开发本地区的文化资源，使“文化力”转化为“生产力”，以促进地区经济和社会的繁荣，便成了当务之急。“区域文化热”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展开的。它的强劲的气势和持续推进的前景，由此得到保证，但不可避免地也会染上某种急功近利的色彩，偏重实用而忽视理论总结，甚至带来若干一哄而起、杂凑成篇的不良学风，需加警惕。

处长江下游太湖流域的三吴地区，有着悠久的文明开发历程，经济实力雄厚，人文资源富饶。吴文化研究在我国各区域文化探讨中起步较早，发展迅猛，成果丰硕，并非偶然。在当前形势下，用好这笔精神财富，推动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开发和文明建设，自有其重要的社会效益。但据我看来，吴文化研究的意义尚不止于此。我在漫议吴文化历史道路的一篇短文中曾经谈到：上古时期吴地稻作生产的出现和推广，为中国古老而发达的农业文明传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唐宋明清江南经济的繁荣，农、林、牧、副、渔多种经营和市镇商品交换盛行所形成的农商复合型社会结构，给古代传统的

近代变革率先作了准备；清末民初民族实业集团于吴地崛起，是在原有农商文化之外，开辟了新型的城市工商文明基地；而晚近乡镇企业遍地开花，“苏南模式”闻名全国，则又在城乡工商与农商间搭起桥梁，初步实现了农工商社会文明一体化。四个台阶、四次飞跃，勾画出一条由古老的农业文明向近现代工业文明转换生成的历史轨迹，其清晰的印记和先驱的作用，是其他地区文化所难以比拟的。据此，吴文化研究不纯然是区域性现象，它包含着更广泛、更深刻的意蕴。

吴文化与近现代海派文化的兴起，有着直接的姻缘组合。上海本属吴文化区的边缘，开埠以来，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上升和国际化都市地位的确立，逐渐孕生出独具特色的海派文化，其影响甚至盖过了吴文化。但两者仍有血肉联系。不仅海派文化内涵的人文气质和商业化导向均渊源于宋明以后的吴文化传统，就是呈现于它身上的古今、中西、雅俗几对矛盾相交织而构成的特异风貌，亦同吴文化近世的演变如出一辙。所以，研究海派文化，少不了吴文化这个参照系。然而两者又有差异。上海由于开埠的作用，在短时间内，由弹丸小县城一跃而为国际性大都会，市民取代乡民，城市压倒农村，由此产生的海派文化，一开始便显现为都市商业性文化，有着浓厚的市民情味和洋化色调。与之不同，吴地社会虽与上海经济腾飞息息相关，毕竟是容括广大农村与众多城镇在内的整个区域，其所经历的工业化与现代化只能是渐进的过渡，于是发

展出一种半土半洋、亦今亦古、俗胜于雅的城乡混合型文化，这就是当下的吴文化。从更多地反映现代工业文明业绩而言，海派文化自有其优长，而若更追寻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推移、演化的踪迹，后者也许更具有典型性。它们之间的共生与互补，是文化研究上饶有兴味的课题。

再拓开一层，吴文化的历史观照，甚至可以放置在更广阔的视野中来把握，尤其对于东亚地区。东亚各国在古代都曾立足于稳固的农业文明，进入近代后，也都面临向工业化社会转变的考验，并经过长期、反复的实践，先后走上适合自己国情的现代化道路。值得注意的是，在这过程中，它们大多避免了西方世界以往常用的以农村破产换取工业起飞的办法，也不像拉丁美洲一些地区搞单一的种植园经济，使农业彻底成为市场商业的附庸，相反，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方式和多种经营的农村生产格局大体保存了下来，并逐步朝向新的技术水平和社会化的生产规模跃进。事实证明，这样的传统农业在经过适当改造之后，不仅可以适应商品经济的运行，且能给现代化工业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以有力的支持，显然这较优之于牺牲农业、片面追求工业化的做法。这种以农业为基础、工农业并举而相互促进的方针，必然会给现代文明建设带来强大的后劲。东亚地区近期经济增幅高居世界前列，这应该是重要的原因。不难看出，吴文化走过的历程，正体现着东亚文明现代化的基本取向，而它在当前形势下所作出和正在作出的种种新创造，

又将大大丰富和加深东亚文明的新经验、新传统。

老友高燮初先生历经风霜，不隳壮志，唯思老有所为，集合桑梓同仁，争得社会各界支持，于无锡堰桥镇办起以民俗文化展示为特色，集思想教育、知识博览、娱乐休闲为一体的吴文化公园，深得中外人士交口赞誉。在此基础上，他又创立全国第一所民间科研机构——吴学研究所，发起、组织有关研讨，出版论文集，编纂《吴文化知识丛书》，大力推进吴文化研究。数年坚持不懈，《丛书》已出版第三辑，在保持、发挥前两辑一题一篇、丰富多采、深入浅出、雅俗共赏特长的同时，另增加各类审美化形态的考察，使吴地社会生活与民情风俗的写照更为全面。整套《丛书》五十种问世，不啻是一部吴文化专业的百科全书。这种不辞辛劳、不图近利、扎扎实实从事基本建设的学风，正是眼下区域文化讨论热潮中应加以肯定和发扬的。燮初先生作为弘扬和开发吴文化的功臣，当之无愧，其以创业者身份而热心于传播学术，尤属难能。谬承厚爱，嘱为之序，敢不从命，略陈鄙见如上，以为吴文化研究之鼓吹云尔。

陈伯海

一九九六年十月

于上海社科院文学所

目 录

- 漫长的历程——吴地歌谣发展源流 …… (1)
- 劳动中的呼声——吴地劳动歌 …… (12)
- 民众的政见——吴地时政歌 …… (19)
- 神圣的乐章——吴地仪式歌 …… (27)
- 歌唱爱情——吴地情歌 …… (38)
- 家常生活伴奏曲——吴地生活歌 …… (45)
- 充满童趣的艺术——吴地儿歌 …… (53)
- 四句为主，长短兼备——吴地歌谣的体式
…………… (64)
- 丰富的音乐个性——吴地歌谣的曲调和唱法
…………… (79)
- 魅力无穷——吴地歌谣的语言艺术 …… (98)

前 言

歌谣是一种口头性的诗歌创作，它具有一定的节奏、韵律、章句和曲调等形式特征，可以歌唱和吟诵。歌谣包括了“歌”和“谣”两个部分，《韩诗章句》云：“有章曲曰歌，无章曲曰谣。”这说明“歌”与“谣”之间的区别主要是在音乐曲调上。“歌”的音乐性较强，有比较稳定的曲式结构和歌词章法；而“谣”的音乐性较弱，大都没有固定的曲调，唱法自由，接近朗诵，歌词一般也都无严格的章法。但是“歌”与“谣”的音乐差别实际上并不十分明显，《诗经·魏风·园有桃》有云：“心之忧矣，我歌且谣。”可见我国古人很早就把“歌”与“谣”当成了一个统一的概念。

歌谣的起源可以一直追溯到人类文化的原始时代。在那些繁重、笨拙的原始劳动过程中，人们为了协调动作，减轻疲劳，就曾呼唱过一些配合劳动节奏的歌调，它们便是人类歌谣创作史上的滥觞之作。随着历史的发展，人类逐渐步入了文明社会，但是歌谣作为一种古老的文化现象，并没有被摒弃于人类文明社会的门外。相反地，每当人类社会进入到一个新的历程，歌谣也总是相应地出现了新的发展和飞跃，它不断地更新着自己的内容和形式，始

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歌谣与人民群众的关系特别密切，长期以来，歌谣一直被那些处于较低文化层次的广大群众用来作为抒情言志的主要工具和手段，歌谣“是人民灵魂的忠实、率真和自发的表现形式，是人民的知己朋友”。

歌谣并不是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中出现的个别文化现象，而是一种具有世界意义的文艺样式。不管是文明程度较高的日耳曼民族，还是文明程度较低的爱斯基摩人，他们都拥有自己的歌谣形式，也都有着对于自己本国和本民族歌谣的深厚情感。歌谣反映人类文化的许多共同性质和共同特点，体现人类世界的较为一致的创造精神。但是，由于地理环境、生产方式、社会条件、文化传统、审美趣味、风俗习惯等等方面的诸多差异，世界各地和各民族的歌谣在体裁样式、思想内容等方面又有很大的不同，即使是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内部的歌谣形式，也经常体会出不同的风格特点。因此，由各民族、各地区创作出来的歌谣形式，在其体裁样式、思想内容、音乐曲调、语言文词方面往往都会带上鲜明的地方色彩。

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民族众多的国家，它的疆土上既有崇山峻岭，也有一马平川，既有江河湖海，也有森林沙漠。它的经济方式也呈现了一种多元化的特点，既有城市型经济，也有农村型经济，既有粟作型经济，也有稻作型经济。它的文化传统更

是显示了一种五彩缤纷的多元化格局。就中国的汉民族而言，其文化传统就有中原文化、齐鲁文化、巴蜀文化、楚文化、吴越文化等等多种类型。由于这些方面的不同特点，中国的歌谣呈现了一种丰富多彩的地方性，这也正是我们在本书中所提出的“吴地歌谣”这一命题的一个基本立足点。

这里所说的“吴地”，指的是包括苏南平原、杭嘉湖平原和上海地区在内的整个长江三角洲地区，这一地区在春秋时期属于吴国的领域或吴国的边缘，因此素以“吴地”相称。在春秋以后的一些朝代中，这一地区的行政归属虽然有一些变动，但是其基本的格局还是没有很大的改变。如汉代吴王濞的封地，是在常、苏、嘉、杭一带；三国孙吴的领地，除了这些区域外又包括了镇江、松江、湖州等地。可见，“吴地”这一区域在行政区划的历史演变中确实保持着较为稳定的统一性。“吴地”概念的提出更重要的是由于其地理环境、经济方式和文化传统上的统一性。从地理环境上看，这里属于一个典型的水网地带，江河纵横，湖泊密布，形成了一种颇有水乡特色的地貌，这与它的邻地苏北、浙南等地的地貌特点显然是不同的。由于地形上的特点，也决定了该地以稻作生产为主的经济方式。《周礼·职方典》云：“东南曰扬州，其谷宜稻。”这一地区的稻作历史非常悠久，早在新石器时代，苏州、无锡、常州、湖州、嘉兴、杭州等地就都已大面积栽种水

稻，这一点从地下发掘的一些考古材料中可以得到明证。两晋南北朝时期，吴地的稻作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到了宋代以后，吴地已经成为全国范围内最为重要的稻作生产基地，全国的稻米大部分要仰仗这一地区来供给，故有“苏湖熟，天下足”之谓。这种典型的稻作生产方式，对当地的民间歌谣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当地大量的栽秧歌、耘稻歌、耨稻歌、车水歌、牵耨歌等等歌谣形式，就是在这种深厚的稻作生产基础上生成传唱起来的。吴地文化传统上的地方特点也表现得相当明显，商周时期，这里是荆蛮民族的领地，展现了“断发纹身”、“羸以为饰”等鲜明的地方土著文化特征。太伯奔吴以后，这里的土著文化与北方的中原文化得到了较多的融合，具有独特风格的地方文化形式——吴文化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开始逐渐形成。吴文化的个性特征十分鲜明地表现在语言等一些文化形式上。这一地区的人们说的是一种具有浓厚地方特色的方言——吴语，它基本上可以作为吴文化的一种显著标志。除了语言形式以外，这一地区的人民在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方面，也形成了许多自己的特色，如吴地的人们都喜好稻食，喜好家居，喜好奢华等等。这些方面的情况在许多古籍中都有记载。

反映在地理环境、生产方式、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地方特色，使“吴地”这一概念的提出获得了较为充分的依据，也使“吴地歌谣”这种地方性歌谣

形式的独立性得到了充分的肯定。顾颉刚先生曾经在《吴歌甲集》序中指出：“沿太湖居住的人民，无论在风俗上、生活上、言语上都不应分隔，这些地方虽是给行政区域划断了，但实际上仍是打成一片的，所以我们尽可沿着旧有的模糊不清的‘吴’名，来广求太湖沿岸人民的歌谣。”这种观点，正是根据自然地理、生产方式，特别是文化传统方面的特点而提出的。

在了解了“吴地歌谣”这一概念的基本性质以后，我们接下来就可以去具体地观察一下吴地歌谣的发展历史、生成环境、思想内容、结构形成、音乐特征、语言运用等方面的特色了。

漫长的历程——吴地歌谣 发展源流

吴地歌谣是伴随着吴地人民的生活史、社会史一起成长、发展起来的。早在商周时期，吴地还处于“刀耕火种，一年一收，半生为食，搭棚为窝”的蛮荒之地。此时当然已经产生了许多原始的歌谣，但是由于时代久远，我们已经无从找到它们的历史踪迹。吴太伯来到吴地以后，在无锡、苏州一带建立了吴国，并且创建了以中原文化与当地土著文化合流为主要特征的吴文化。当时的吴地歌谣，正是在这种文化混合的社会环境中发展起来的。据无锡等地的方志记载，太伯、仲雍来到无锡梅里以后，就“以歌代教”，向当地的老百姓传授过许多歌谣，当地民间至今也还有“梅里花，梅里果，太伯教民唱山歌”的传说。太伯传歌之说虽然有一定的附会成分，但它却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太伯奔吴以后，中原文化对于吴地的土著文化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以及中原歌谣在吴地民间广泛传播的历史事实。到了春秋时期，当时的吴国统治者经常杀伐征战，给当地人民带来了很大的苦难，因此，吴地的歌谣也较多地反映了这一方面的现实。《吴越春秋》中所记载

的“渔父歌”，表现的就是这方面的情况。当时伍子胥在逃往吴国的途中受到追击，便向江中的渔父求渡。渔父一边撑船，一边唱歌道：“日月照耀乎寢已驰，与子期乎芦之漪。”接着又唱道：“日已夕兮，余心忧悲，月已迟兮，何以渡为？事寢急兮，将奈何？”这两首“渔父歌”虽然不能完全反映当时吴地歌谣的完整面貌，但其形式也多少可以使人窥见吴地歌谣体制风格之一斑，特别是歌中的句式结构与“兮”字的运用方式，体现了较为明显的南方民歌特点。

在两汉至魏晋南北朝这一漫长的历史阶段中，吴地的民歌民谣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当时的吴地歌谣主要表现出两种较为明显的倾向：其一是反映时事政治与现实社会生活的民谣大量产生，这种现象的出现主要是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动荡不安有关。两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战争最为频繁、政局最为多变的时代，这一时期中宫廷政变、士族倾轧、诸侯割据、盗贼纷起等社会现象，给吴地人民带来了极大的苦难，也引起了当地人民的强烈不满，因此当地出现了许多反映这方面内容的民谣。如东汉永元时期的会稽童谣：“弃我戟，捐我矛，盗贼尽，吏皆休”，反映了当时社会政局不稳、盗贼纷起的历史现实。西晋建兴时期的江南民谣：“匍如白坑破，合集持作甌。扬州破换败，吴兴覆甌甌。”反映了当时扬州、吴兴等地被战争和军队严重破坏的

历史现实。当然其中也有一部分民谣是对当时一些为官清廉，政绩显著的官吏们的歌颂，如：“城上乌，哺父母，府中诸吏皆孝友”。颂扬了东汉时会稽太守张霸的高尚品质。又如“统如打五鼓，鸡鸣天欲曙，邓侯拖不留，谢令推不去。”表现了人们对于西晋太子中庶子邓侯的怀念、留恋之情。

另一种倾向是歌唱男女爱情、男女思恋的情歌大量涌现。东晋以后，吴地的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商业性的城市有了较大的繁荣。曾经做过东晋和宋齐梁陈几朝都城的建业（今南京），更是成了一个繁华之地。与吴地这种城市经济相适应的，是一个较为庞大的市民阶层的出现。他们的生活条件较为优越，受封建礼教的约束较少，思想比较大胆自由，因此，大量表现男女爱情的歌谣便在这一庞大的市民群体中繁盛兴旺起来。在宋代郭茂倩编的《乐府诗集》中，收有东晋至宋齐梁陈时期的吴声歌曲 300 多首，其中如《子夜歌》（42 首）、《子夜四时歌》（75 首）、《懊侬歌》（14 首）、《华山畿》（25 首）、《读曲歌》（89 首）等等，几乎全部是歌唱男欢女爱的情歌。这些情歌的文词非常优美，构思非常巧妙，抒情非常真切，描绘非常细致，它们代表了当时中国民间歌谣中的最高艺术水平，如《子夜歌》中这样唱道：“始欲识郎时，两心望如一。理丝入残机，何悟不成匹。”“前丝断缠绵，意欲结交情。春蚕易感化，丝子已复生。”《读曲歌》中这样唱道：“谁交疆缠绵，

常持罢作意。走马识悬帘，薄情奈当驶。”“千叶红芙蓉，照灼绿水边。馀花任郎摘，慎莫罢依莲。”这些歌曲中的词语是那样的优美生动，情调是那样的婉转缠绵，它们体现了吴地情歌浓重的地方特色。晋代刘义庆的《世说新语·言语》云：“何以共重《吴声》？羊曰：以其妖而浮。”“妖”指的是“缠绵”，“浮”则为“浮艳”，它们的确是当时吴地情歌艺术风格上的主要特点。

两晋南北朝时期，吴声歌曲的中心，是当时的都城建业。建业是当时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也是市民群体的集中地，因此吴声歌曲大部分都是先在建业兴盛起来的。《晋书·乐志》云：“吴声杂曲，并出江南，东晋以来，稍有增广。其始皆徒歌，既而被之管弦。盖自永嘉渡江之后，下及梁陈，咸都建业，吴声歌曲，起于此也。”这一记载把当时吴声歌曲的流传时间、流传范围以及发展过程都已说明得相当清楚。当时吴地的广大农村中，当然也有大量的歌谣流传，而且繁荣于建业等吴地大城市中的吴声歌曲，实际上也正是在吴地农村歌谣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只是这些充满农村味的民间歌谣到了城市中以后，经过了文人之手的加工和改造，其文词由平实朴素、率直坦白变成了绮丽华美、缠绵悱恻，其音乐由“徒歌”变成了被之管弦的“乐歌”而已。

唐宋时期的吴地歌谣也很兴盛，但是由于史料